

中共行为之根源

MIKE GALLAGHER

中国共产党的敌对性扩张是与生俱来的，它对自由世界构成的威胁与乔治·凯南时代以来的任何情况均不相同。

威斯康星州的乔治·凯南（George Kennan）在 1946 年给国务院的长篇电报中认为^[1]，苏联政权的性质导致了苏联与美国之间不可调和的分歧。苏联领导人“狂热地认为，与[美国]不可能有永久的共存方式（妥协方式）”。为了维护苏联自己的权力，必须打破“[美国]这一国家的国际权威”。在凯南看来，应对这一威胁，将是“我们的外交面临过的最伟大的任务，也可能是我们的外交今后将面临的最伟大的任务”。

今天，我们也面临着类似的战略挑战。正如美国副总统彭斯（Mike Pence）在 10 月的讲话^[2]中概述美国与中国的战略竞争时所说的那样，几十年来美国的善意接触战略让中国的统治者更加胆大妄为。在东海和南海问题上，在扭曲自由市场和窃取知识产权问题上，以及在中国国内和世界范围内挑战民主价值观方面，中国共产党的侵略性越来越强。这些行动反映了中共为实现中国国力的最大化，而以牺牲美国，牺牲我们与我们的盟友几十年来所坚持的自由主义准则为代价的整体性做法。

自由世界面临着自凯南时代以来从未见过的威胁。彭斯的讲话是对这一事实的滞后承认，也是迄今为止对中共进犯行径之最突出阐

^[1]<https://nsarchive2.gwu.edu/coldwar/documents/episode-1/kennan.htm> 译者按：原文无脚注而使用了超链接，译文为便于读者阅读，特将超链接以脚注单独列出。

^[2]<https://www.hudson.org/events/1610-vice-president-mike-pence-s-remarks-on-the-administration-s-policy-towards-china102018>

述。然而，他并没有解释为什么中共的行为采用了如此之方式。

七十年前，凯南写道^[3]，“苏联政策的特点……是苏联权力的内在性质的基础，会一直贴着我们。……直到苏联权力的内在性质被改变”。同样，了解中共也是了解中国的对外野心，以及为什么中共的野心不能与自由世界的价值观调和的原因。在中共权力的内在性质发生变化之前，中共政权将奉行损害美国及其盟友利益的政策。以下是对中共行为的来源的仔细研究，或者换个说法，是对中共政权的性质及其行为之间的联系的研究。

中国历史长河的阴影

中国共产党行为的第一个来源是中国历史，或者更准确地说，是中共坚定持有的中国历史和被中共所维持的关于中国历史的叙述。有两种叙述非常突出，它们都反映了真实历史的政治化版本，并融合了沙文主义、不安全感和帝国野心。

第一种叙述来自于中国的王朝史。与欧洲境内的国家间不断争夺权力不同的是，中国有很长一段时间没有真正的对手。¹尽管王朝兴衰，但中国人把自己看成^[4]是“天下”的中心，或者说是绕着他们而转的世界的中心节点。在某种程度上，中国人确实是这样。通过一种将中国的经济和政治影响力延伸到东亚大部分地区的制度，中国的统治者们接受^[5]“换取经济利益，有时是安全利益”的朝贡。从中共总书记习近平 2014 年提出^[6]的“亚洲新安全观”的宣言中可以看到这种说法的回声，他在宣言中呼吁“亚洲的事情归根结底要靠亚洲人民来办，亚洲的问题归根结底要靠亚洲人民来处理，亚洲的安全归根结

^[3] <https://www.foreignaffairs.com/articles/russian-federation/1947-07-01/sources-soviet-conduct>

^[4] <https://blog.oup.com/2018/02/zhongguo-tianxia-chinese-international-relations-terms/>

^[5] <https://www.lowyinstitute.org/publications/chinese-worldviews-and-china-s-foreign-policy>

^[6] https://www.fmprc.gov.cn/mfa_eng/zxxx_662805/t1159951.shtml

底要靠亚洲人民来维护”。

习近平的意思很明确：现在是美国人离开的时候了，也是中国回到其理想传统上居于亚洲邻邦附属国的上国地位的时候了。

第二种叙述是，中国面临的重大威胁是软弱的中央领导层招致外国侵略及其对应的民族屈辱。这种说法来自于中国历史上的几个不同时期。一个是公元前五世纪初至公元前三世纪，被称为战国时代^[7]。在这个窗口期，中国的政治更像欧洲，多个独立的国家相互制衡，不时转变效忠对象，争夺权力。一千五百多年以后的另一个虚弱时期，从 1839 年的鸦片战争开始，殖民势力逐渐侵蚀中国的主权，一直到 1945 年国民党和盟国战胜了日本帝国主义的时期^[8]，中国共产党称之为“百年屈辱史”。

当代中共领导人操纵这些叙事，为中国在周边地区的镇压和扩张开脱。从战国时期开始，中国领导人就继承了对领土分裂的不安全感，现在包括对台湾和西藏。这种不安全感解释了为什么统一台湾是总书记习的“民族复兴”的“中国梦”^[9]的核心——尽管台湾从来没有被中共控制过，也很少被大陆地区的任何中国政府控制。中共领导人还不断培养一种对外国干涉的不满情绪，而在中共的话语^[10]中，只有共产党能阻止之前出现过的这种情况，也只有共产党才能再次防止这种情况发生。

中国的历史也指导着中共领导人，让他们借鉴其称为“制夷”（“barbarian handling”）的悠长传统。早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前，中国就已经掌握了让对手依赖中国在经济上的慷慨解囊。中国还成功

^[7]<https://thediplomat.com/2013/12/why-chinese-study-the-warring-states-period/>

^[8]<https://thediplomat.com/2014/09/the-ccp-didnt-fight-imperial-japan-the-kmt-did/>

^[9]<https://www.scmp.com/news/china/politics/article/2180391/chinese-president-xi-jinping-urges-taiwan-follow-hong-kong-model>

^[10] <https://www.lowyinstitute.org/publications/chinese-worldviews-and-china-s-foreign-policy>

地对竞争者进行了教化，迫使相互竞争的国家的领导人逐渐向中国的价值体系靠拢。历史学家 Edward Luttwak 写道，这些做法的效果是使对手“在心理上和经济上都依赖帝国的光辉，当汉人衰弱时帝国的光辉会以兄弟般的方式撒向对手，而当[对手]沦为附庸时他们接着撤回雨露。”²

这段历史给中共的决策蒙上了悠长阴影。它使中国习惯于将各国视为霸主或附庸，而不是平等者。它教会了中共领导人在经济上让其他国家依附于自己，并操纵外国精英的舆论将中国的力量视为良性的或有益的。而在中国内部，它助长了一种习惯性焦虑，担心中国随时可能抵挡不住分裂主义运动，重新陷入分裂局面。所有这些特质，在中共的日常行为中都有明显的表现。

作为地下组织的中共

中国共产党行为的第二个来源，也是西方人习惯性忽略的一个来源，是中共作为地下势力组织（underground influence organization）的历史。中共从最早的时候起，就扮演着造反者的角色，先是在中国国内，随着中共试图扩大自己的势力范围，然后是在国外。这种斗争的一个核心工具就是“统一战线”工作，或者说“通过一系列的方法来影响海外华人社团、外国政府和其他主体采取支持北京当局偏好之政策的行动或立场”。³有时，中共通过教育或文化团体等看似良性的组织来引导这种活动，悄无声息地促进党的利益。另外的时候，统一战线涉及的活动显然是非法的，比如贿赂或敲诈。无论其形式如何，统战工作的目的始终是“扼杀对中共的批评，传播对中国的正面看法，影响外国民主国家的选民采取对中国更有利的国内政策”，正如最近的一份国会报告所说的那样。⁴

虽然统战工作起源于列宁，但是在中共的领导下开花结果。中共在成立的那几年里，由于实力太弱，无法对日本人或国民党构成军事上的威胁，而依靠“情报”活动（该词在中共话语中经常与统战交替使用）。中共认为^[11]其地下组织活动在 1949 年内战的胜利中发挥了决定性作用。中共中央政治局甚至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不久就通过了一项决议，强调情报工作在党的成功当中所发挥的作用。⁵

精于统一战线工作的人很快会在中共的官僚机构中崭露头角。今天中共核心领导层中的许多人，包括总书记习本人，都是统战口出身的领导人的直系后裔。John Garnaut，一位澳大利亚记者出身的政策制定者，曾在提醒西方领导人注意中共对民主社会的干预日益增多的情况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他认为^[12]，像习总书记的父亲习仲勋这样的人，“并不是在战场上通过军事上的卓越表现，赢得了在革命领袖的位置。相反，……[他们]是统战工作能手，通过篡改和操纵中共对手的语言、观念和行动爬上了高位”。

从这个角度看，中共的根基与其说是作为一个政党，不如说是一个造反组织，其核心任务是为了取得权力而操纵外界的看法。正如加尔纳特所说：“中共现在的机构、意识形态和方法论继续反映了它的地下组织起源”。虽然中国共产党的统战部在名义上负责监督这些统战工作，但“中共的 8 600 万党员中的所有党员在与非党员打交道时都要承担起统战责任。简而言之，舆论工作（influence work）是中共的专长”。

近年来，习总书记把统战工作作为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法宝”，组建并亲自领导统战工作小组，委派统战干部担任要职，

^[11] <https://www.themonthly.com.au/issue/2018/august/1533045600/john-garnaut/australia-s-china-reset>

^[12] <https://www.themonthly.com.au/issue/2018/august/1533045600/john-garnaut/australia-s-china-reset>

并新增约 4 万名统战干部。⁶这些活动日益使中共与国外的民主制度发生冲突。统战工作不仅仅是中共举止不端的那一部分，它是中共的身份、历史和全球目标的核心。只要中共统治中国，统战工作就会在中国的外交政策中占据重要地位。

独裁和“安全”

中共行为的第三个关键来源是其权力的独裁性。如同任何专制的统治阶层一样，中共领导人害怕失去权力。中共认为^[13]自己正在进行一场反对西方观念的“存亡之争”，这些观念包括民主、人权的普遍性、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甚至新闻独立。

在一份遭到泄露的被称为 9 号文件的臭名昭著的备忘录中，中共领导人用奥威尔式的措辞，阐述了一场生死攸关的意识形态斗争，反对国内外的“错误的意识形态思潮”。中共宣传机构在该文件中把自由主义民主描绘成过时和无效的，进而敲打国内舆论。正如中共的新华社所说^[14]：“经过几百年的时间，西方模式正在暴露其时代性。现在是时候深刻反思衰弱而问题重重的西方民主制度了，西方民主制造了这么多的世界问题，又解决不了多少世界问题。”其目的是在诋毁西方思想的同时，将中国作为发展中世界的替代性模式来展示。例如，一家中共的宣传机构认为^[15]，最近美国政府的停摆表明，美国的“民主制度和政府无法解决收入差距扩大、不同阶层之间的对立、党派加剧极端化等问题。[...]100 多年^[16]前设计的政府机制正在失灵。”

中共的意识形态斗争意识也形成了一种绝对主义的安全观。正如中国分析家 Peter Mattis 所认为的那样，中共对绝对安全的追求体

^[13] <https://www.wsj.com/articles/beijings-secret-memo-1429841508>

^[14] <https://www.reuters.com/article/us-china-congress-politics/china-state-media-attacks-western-democracy-ahead-of-congress-idUSKBN1CM0AB>

^[15] <http://www.globaltimes.cn/content/1135224.shtml>

^[16] http://eng.mod.gov.cn/publications/2017-03/03/content_4774229.htm

现在 2015 年的《国家安全法》中，该法将“国家安全”定义为政权、经济利益或领土完整不受内外力量威胁。由于中共不能通过选举来主张自己的合法性，因此，中共通过在国内外扩大权力，特别是利用技术手段进行社会控制来寻求合法性。来自 Jamestown Foundation 的分析认为，中国的国内安全支出近年来急剧增加，从 2010 年开始，中国的国内安全支出开始超过中国的军费支出。例如，2017 年，国内安全支出超过对外国防预算约 19%。^[17]

这些投资支持了一个“社会信用”^[18]系统，目前正处于试点阶段，该系统是根据中国公民最私密的数据整理出的 Uber 式的社会信用评级：他们的个人财务状况、交通违章行为、记录在手机上的私人信息、在网上和商店里浏览或购买的内容、要去哪里，以及与谁交往——这些活动都是由数以亿计的与面部识别软件绑定的监控摄像头自动监控的。对政府的忠诚度也会被计入，如果认为不够忠诚，就会受到惩罚。分数较高的公民会得到一些好处，如更容易获得信贷、入住豪华酒店、更低的保险费、更快获得政府服务、获得最好的学校的奖学金等。批评或组织反对中共政策的个人，可能会发现申请大学、旅行甚至找工作都很困难。

居高位的中共成员和中国实业家将推广监视技术，不仅作为保证对党服从的手段，而且是为了在其他每一个马克思主义实验失败的地方都能成功。正如中国在线零售商京东的创始人刘强东所说^[19]的那样，“通过这两三年我们的技术布局，我突然发现其实共产主义真的在我们这一代就可以实现”。阿里巴巴创始人、中共党员马云曾认为

^[17] <https://jamestown.org/program/chinas-domestic-security-spending-analysis-available-data/>

^[18] <https://www.wsj.com/articles/chinas-new-tool-for-social-control-a-credit-rating-for-everything-1480351590>

^[19] <http://www.globaltimes.cn/content/1062482.shtml>

^[20]，“通过对各种数据的获取，我们或许能找到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在这两种情况下，硅谷式的对技术变革力量的盲目信仰与中共对中国社会和经济的集权和充分控制的具体野心融合在了一起。

中共选择了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中共在这里认为其受到了信伊斯兰教的维吾尔族分裂分子的威胁——来实地测试其控制工具，并让人一瞥其所寻求的安全之逻辑结果。正如联合国的一份报告^[21]所说，中共“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变成了一个类似于笼罩在秘密中的大规模拘留营，一个‘无权利区’”。在这些集中营中，“被拘留者要接遭受水刑，被隔离关押而没有食物和水，不准睡觉。”⁷被拘留在集中营中的总人数可能高达 300 万^[22]，约占新疆全部维吾尔族人口的 38%。在拘留营之外，新疆人还面临着持续的安检和无处不在的监控。维吾尔族人必须下载一个扫描个人资料的智能手机应用^[23]软件^[24]，包括手机内的照片、视频、证件等，供政府审查。

中共正在利用新疆来使其在全中国境内的极权主义监视式政权变得完美。这一过程，正在暴露出中共为了保持权力和实现其在海外的意图而不惜一切代价。

统战工作与颠覆西方体制

受到中国历史和其自身作为地下组织的历史，以及其对总体安全的需要之驱动，中共以干涉外国社会为目的。就像 1946 年的苏联一样，中共的动机、经验、偏见和目标与自由世界无法调和。中共不相信与其美国会在长时段内相互妥协——至少在印太地区不相信。

^[20]<http://www.aei.org/publication/lessons-from-the-great-recession-a-long-read-qa-with-michael-strain-and-stan-veuger/>

^[21] <https://www.ohchr.org/en/NewsEvents/Pages/DisplayNews.aspx?NewsID=23452&LangID=E>

^[22] <https://www.reuters.com/article/us-usa-china-concentrationcamps/china-putting-minority-muslims-in-concentration-camps-us-says-idUSKCN1S925K>

^[23] <https://www.rfa.org/english/news/uyghur/report-uyghurs-in-china-forced-to-install-surveillance-app-that-leaves-their-data-unsecured-04102018164341.html>

^[24] <https://www.opentech.fund/news/app-targeting-uyghur-population-censors-content-lacks-basic-security/>

随着中国国力增强，它变得更具有侵略性、好战性和胁迫性。从南海军事化，从广泛的强制技术转让到抢占全球经济的制高点，再到制造对发展中国家的债务外交陷阱，考虑其独特的政治个性才能理解中共的行为模式。而且正如彭斯副总统所说的那样，中共在一个领域的好斗与其在另一个领域的侵略性是分不开的。中共的军事行为与其经济举措直接相关，而这些又与其政治干涉活动相联系。

中共旨在颠覆和腐蚀西方的重要机构的政治干涉活动是最少受到研究的，是其侵略形式中最精致的也可能是最重要的了。虽然在有争议的岛屿上部署军事装备或侵入美国人事管理办公室的网络所构成的威胁很容易理解，但中共对西方机构系统性地去合法化（delegitimization）则更具有迷惑性。

例如，在联合国，在天安门广场大屠杀之后的 15 年里，中共在联合国挫败了十几项谴责其侵犯人权的决议^[25]，中共往往利用其经济实力帮助其从发展中国家那里争取到选票。虽然中共在联合国继续在人权问题上为自己进行防御，但近年来，它开始进攻了，使用贿赂和恐吓手段，并在这个过程中使腐败和统战式的政治战之间的界限变得难以区分。

考虑一下严雪瑞（Sheri Yan）的案例，她是一名中国出生的社会名媛，2015 年因涉嫌贿赂联合国大会前主席 John Ashe 而被捕。^[26]通过一个复杂的中间人网络，包括疑似中共间谍，严雪瑞用她的联合国指定的非政府组织，将统战机构的数十万美元输送到包括 Ashe 在内的有影响力的联合国官员那里。同时，她的非政府组织还雇用了第二任联大主席 Sam Kutesa 的妻子。据称，Kutesa 从与统战部门有联

^[25] https://www.brookings.edu/wp-content/uploads/2018/09/FP_20181009_china_human_rights.pdf

^[26] <https://www.smh.com.au/world/asia/beijing-s-secret-plot-to-infiltrate-un-used-australian-insider-20181031-p50d2e.html>

系的前香港官员何志平（Patrick Ho）那里收受了 50 万美元的贿赂。何志平还被指控^[27]利用与联合国有关的非营利组织贿赂联合国外交官，包括向 Kutesa 和 Ashe。何志平利用其有影响力的地位，不懈地鼓吹“一带一路”倡议。当被问及何志平的腐败行为和他对“一带一路”的支持时，联合国发言人响应了习近平的精确用语，称该倡议是“共赢合作”之路。

中共的统战工作也以颠覆言论自由制度为目标，特别是针对国外的大学。鉴于学生在天安门示威中发挥的关键作用，中共成立了中国学生学者联谊会（CSSAs），以重新确立对国内外学生的意识形态控制。在美国，超过 142 个学生学者联谊会分会的公开目的是为了帮助在国外学习中国学生，但另一重目的是中共为了限制这些学生的言论自由和行动自由。⁸

田纳西大学中国学生学者联谊会分会要求会员“保护祖国的荣誉和形象”，同时强迫台湾学生支持“国家统一”。⁹联谊会分会曾威胁要报复邀请达赖喇嘛进校园的学校，而即使是那些对顺服中共比较犹豫不决的学生，也被逼着向政府官员提交合作证明。¹⁰随着中国学生学者联谊会受到政府支持的性质受到更多的关注，许多分会删除、模糊或隐瞒了其与中共的财务关系。而有时，联系会更公开，中共的细胞已经在半打以上的州出现了，从加州到纽约，遍布全国各地。在伊利诺伊大学厄巴纳-香槟分校的一个案例中，学生们在国外留学回国后，被迫^[28]要他们透露自己的同学是否表现出过“反党思想”。

当一名在中国学习新闻专业的德国学生在报道侵犯人权的事件

^[27]https://www.yahoo.com/news/china-wants-new-world-order-u-n-china-linked-ngos-secretly-paid-cash-promote-beijings-vision-145746181.html?soc_src=hl-viewer&soc_trk=tw

^[28]<https://foreignpolicy.com/2018/04/18/the-chinese-communist-party-is-setting-up-cells-at-universities-across-america-china-students-beijing-surveillance/>

后被开除时，中国官方媒体发表了一篇专栏文章，责备他不遵守中国法律。该专栏文章认为^[29]：“如果[该学生]是在德国留学的中国学生，中国人民会接受他必须遵守德国法律。但最糟糕的是，一些德国人和西方人认为，他们的法律应该在中西方摩擦中起主导作用，甚至在中国，他们的法律应该起主导作用。原因是他们认为他们的法律是万能的。”

这种说辞是虚伪的。去年 11 月，一支中国足球队在亲西藏的示威者出现在比赛现场后，中断^[30]了在德国的访问。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强调^[31]，“相互尊重是正式的东道主应该为客人提供的，任何两个国家之间的尊重都应该是相互的。”

根据中共的说法，中共的规范，特别是在涉及到言论自由（或缺乏言论自由）时，应在国内和国外都占上风。

除了言论自由之外，中共还攻击国家主权制度，中共认为所有华裔个人，无论其公民身份如何，都对中共负有义务。例如，中国驻马来西亚大使在谈到马来人华人时说^[32]：“无论你走多远，无论你留多少代，（对）海外华人来说，中国永远是你温柔的娘家”。他还警告说，面对“侵害中国国家利益或侵犯中国公民和企业合法权益的行为”，中国不会“坐视不管”。

近年来，中共扩大^[33]了对“华人”国籍的主张，无论其实际国籍和意愿如何。2017 年，中共官员提出了统战工作的宏伟蓝图^[34]，确保“所有海内外华人都在为实现中国梦而努力奋斗”。作为这一战略

^[29] <http://www.globaltimes.cn/content/1115176.shtml>

^[30] <https://www.scmp.com/news/china/policies-politics/article/2121698/chinas-under-20-footballers-return-home-after-german>

^[31] <https://www.bbc.com/news/world-europe-42124444>

^[32] <https://www.straitstimes.com/asia/se-asia/kl-wants-chinese-envoy-to-explain-remarks>

^[33] <https://www.lowyinstitute.org/the-interpreter/china-influence-defence-parliamentary-sovereignty>

^[34] http://www.china.org.cn/china/2017-10/23/content_41777176.htm

的一部分，中共鼓励海外华侨积极参与政治活动，以“动员公众舆论。…在海外推动中共的经济和政治议程。”¹¹ 仿佛将海外华人选民作为一个选票团体，中共最近威胁说^[35]，如果澳大利亚工党不支持北京提出的引渡条约要求，就会吞下政治恶果。

在一系列高关注度案件中，中共还拘留了它声称是中国公民的外国公民。一名在中国出生的瑞典公民被中共当局绑架^[36]了两次，一次是在泰国度假时被绑架，一次是当着瑞典官员的面从上海乘坐火车离开时被绑架。这名瑞典人在被扣押期间发表了一份人质式声明^[37]：“虽然我现在持有瑞典国籍，但在内心深处，我仍然认为自己是中国人。我的根在中国。”

在另一起案件中，两名年轻的美国人 Victor 和 Cynthia Liu 以及他们的母亲被任意关押在中国。虽然 Victor 是在美国本土出生的，但中国外交部认为^[38]，这三人都是中国公民。在这两种情况下，中共的意思很明确：中国人的血统取代了他国及其公民的权利。

我们为什么要小心翼翼？

美国人可能会有理由问，为什么中国的这种侵略行为如此重要。中国 and 任何强国一样，都在侵略性地追求自己的利益。即使中共成功地建立了一个“亚洲人的亚洲”，取代美国成为印度洋太平洋的主导力量，美国仍将拥有强大的经济，在西半球的主导地位，受到磨损但强大的同盟关系，尤其是在欧洲。

为了理解为什么这种情况会威胁到美国的利益，凯南电报再次提

^[35]<https://www.theaustralian.com.au/nation/foreign-affairs/chinas-veiled-threat-to-bill-shorten-on-extradition-treaty/news-story/ad793a4366ad2f94694e89c92d52a978>

^[36]<https://www.theguardian.com/world/2018/feb/22/how-china-snatched-gui-minhai-train-beijing-bookseller-hong-kong>

^[37]<https://www.abc.net.au/news/2016-01-18/missing-hong-kong-book-publisher-gui-minhai-china-custody-arrest/7094276>

^[38] <https://www.nytimes.com/2018/11/25/us/politics/china-exit-ban.html>

供了一个有用的框架。1948 年，凯南认为有五个工业和军事力量中心：美国、英国、德国和中欧、苏联和日本。美国的首要利益是确保苏联的政治控制权不会延伸到苏联本身以外的任何一个中心。¹²

今天，经济生产和权力的中心——凯南试图捍卫的要塞——已经转移到了印度洋太平洋地区。根据一些人的估计，到 2050 年^[39]，亚洲本身可能占到全球 GDP 的一半之多。正如 Jakub Grygiel 所认为的那样，中国在东亚的增长与俄罗斯在欧亚大陆的虚弱结合在一起，改变了权力位置，很可能使东亚的海上通道成为“世界的关键命脉”。¹³在这种把经济力量集中在自己的后院的情况下，中共没有必要为了主导全球经济而把力量投射得很远。

因此，美国从印太地区的撤退将使世界经济活动的关键枢纽落入中国手中。鉴于其过往，中共将利用这一印太势力范围，进一步颠覆西方体制，赢取艰难的承认。

中国共产党不会满足于“解决”台湾或西藏问题，然后专注于中国的内部发展。它将扩大其日益增长的监视国家的范围，把反对其政策的非中国公民作为目标。它将在弱国中培养依赖性，建立一个附庸而非伙伴的体系。最重要的是，美国和我们的盟国在二战后建立的自由和开放的世界，以及全球生活水平和人权的相应改善，将被无序地争夺全球公地的竞争和稳步扩张的中共社会控制所取代。中共的奥威尔噩梦将取代美国的洛克梦。

通过他们的行动，中共领导人一再告诫我们，这就是他们正在努力建设的世界。中共的政策反映了一个非常明确和全面的议程，即超越美国，在印度洋太平洋地区取代我们，并腐蚀我们最重要的机构。正如凯南对苏联人说的那样，他们表现出“谨慎、持续地施压以破坏

^[39] <https://www.adb.org/sites/default/files/publication/28608/asia2050-executive-summary.pdf>

和削弱一切对手的影响力和对手的权力”。

制定反芬兰化战略

为了阻止这种未来境况出现，我们必须首先认识到，我们正处于一场争夺全球领导权的竞争中——但直到最近，只有一方在发力。不过，有一些迹象表明，美国开始在认真对待这一挑战。2017 年的《国家安全战略》和 2018 年《国防战略》都将中国确定为修正主义大国（revisionist power）和美国的最大威胁。过去两年来，美国国会也采取了重要的两党联合措施，如取消 2018 年和 2019 年的国防开支上限，扩大对中共指挥的在美国投资的审查权限，通过 BUILD 法案以帮助满足国际社会对基础设施投资不断增长的需求，以及曝光大学校园里的中共间谍威胁。

换句话说，美国正在认识到存在的挑战，但我们仍然需要一个明确的框架来指导我们的行动。如果说遏制是美国对苏联的行动框架，那么今天我们需要一个新的组织原则，至少在中共仍然执政的时候。研究一下苏联与芬兰而非苏联与美国的关系，或许可以找到一个新的组织原则。“芬兰化”（Finlandization）成为冷战时期一个名义上独立但功能上从属的国家之简称。正如一份解密的中情局报告所描述^[40]的那样，芬兰人“希望通过大幅限制独立性来保持独立，通过总体上向一边倾斜来确保中立，通过在某些关键领域限制他们的民主权益来维持他们的民主权益。…在实践中，这一政策意味着芬兰的经济利益和政治倾向经常被牺牲掉，以缓和苏联的怀疑和满足苏联的要求”。

今天，美国必须把努力的重点放在防止印度洋太平洋及其他地区的芬兰化上。归根结底，反芬兰化（counter-Finlandization）战略涉及到选择，不是在中国和美国之间进行选择，而是确保盟国和伙伴

^[40] <https://www.cia.gov/library/readingroom/docs/esau-55.pdf>

有信心和能力选择他们自己的道路，而不受经济和军事胁迫。

希望维护自己的独立、地区和平和经济繁荣的国家，将必须在认识到这三者都受到中共的威胁情形下行动起来。这并不意味着我们的朋友们必须始终同意我们的观点，这仅仅意味着当国家的自我利益与中国的利益发生分歧时（将会时常发生），要站出来维护国家的利益。

一个有效的反芬兰化战略应该强调三点：物质力量、盟友和价值观。综合起来看，这些要素不仅是有效战略的基础，而且是美国国家力量的源泉。就像我们考察了中共的行为来源一样，我们必须了解我们的竞争优势，并将我们的战略根植于使我们成为历史上最强大的国家的持久的美国原则中。

这要从物质力量开始，包括经济和军事力量。美国的经济实力不是凭空出现的。我们的开放经济、自由社会和对法治的尊重创造了一种创新和勤奋工作的文化，将美国推到了全球经济的前沿。当然，我们存在监管负担、寻租行为和特定利益集团俘获问题，但我们的制度仍然自我维系为能给投资者和企业家以信心。这是一个核心优势，也是我们应该努力保持的。

随着全球经济越来越依赖先进的并且是容易被操纵的技术，为了国家的利益和自身底线，私营部门必须自愿地站出来。工业界需要在与中国相关的信息技术供应链安全和与中共的军民两用技术研究合作之间做出艰难选择。特别是，硅谷作为企业社会责任运动的领导者，应该更新其社会责任的概念，将可能导致侵犯人权或开发先进武器系统的技术合作排除在与中共的技术合作之外。我们必须确保塑造全球经济未来的技术属于美国而不是中共。

与经济实力齐头并进的是美国的军事实力。我们的首要目标必须

是确保美国和中国的军事能力之间的相对差距如此之大，以至于每一个盟友和对手都明白，任何中美之间军事冲突都会以美国的决定性胜利而告终。这不仅仅是为了赢得一场潜在的战斗；而是为了建立一个有利的和平时期条件，使得盟国和伙伴们感到安全，让中国领导人知道即使是对小国进行胁迫，也是徒劳的。这不会是廉价的。但正如前国防部长詹姆斯·马蒂斯所说^[41]的那样，“美国能够负担得起生存的代价”。

在近期国防预算增长的基础上，美国政府必须至少按照国防战略委员会的计划，每年实际增长 3%至 5%的国防预算，以建立军力结构和下一代军力。¹⁴此外，政策制定者应集中精力防止国防战略的设计者 Elbridge Colby 所描述^[42]的中国潜在攻击的“最有效的形式”：中国人民解放军迅速夺取领土，然后将可能的反击成本提高到会使美国望而却步的程度。国防战略强调了从惩罚性的威慑转向否认性的威慑的战略转变未得到应有重视，其目的就是要做到这一点。国会必须进行严格的监督，确保五角大楼落实这一变革性转变。

美国的朋友、盟友和伙伴构成了反芬兰化战略的第二个组成部分。由于二战后实施的高瞻远瞩的政策，美国现在在印太地区及其他地区享有强大的同盟体系。美国政府必须抓住一切机会，拉近与澳大利亚、日本、韩国、印度、台湾等区域力量的距离，同时也要寻找享有共同利益的新兴伙伴。

简单地说，我们是印太地区的客队，如果不与地区盟友和合作伙伴建立密切的工作关系，我们就无法阻止芬兰化。培养地方盟友使我们有更多的军事、政治和经济机会，并为应对危机提供了选择。正如

^[41]<https://dod.defense.gov/News/Transcripts/Transcript-View/Article/1702965/remarks-by-secretary-mattis-on-national-defense-strategy/>

^[42] <https://foreignpolicy.com/2019/05/05/how-to-win-americas-next-war-china-russia-military-infrastructure/>

中国学者阎学通在 2011 年写到^[43]，“中美之间竞争的核心是看谁拥有更多高质量的朋友”。

关键的是，这种争取朋友的情况并不限于印太地区。中共正试图在任何地方、任何时候离间美国美国的伙伴之间的关系。这一点在美国全球联盟核心的五眼情报共享联盟中表现得最为明显。最近几周，中国暴露了美国与英国的“特殊关系”中的一个关键分歧，因为据英国方面的报道^[44]英方决定允许华为进入英国的 5G 网络——这一决定最终使国防部长 Gavin Williamson 丢了工作。与此同时，新西兰表示^[45]将与中国在“一带一路”上合作，“一带一路”被国务卿蓬佩奥强烈批评^[46]为中国的“掠夺性放贷行为”。鉴于中国能够在美国联盟内部核心成员中取得如此规模的胜利，不难想象，中共将如何利用并加剧美国与美国的伙伴间的矛盾关系。

加强与盟友、朋友和伙伴的关系，将采取大大小小的行动。政府应该回归到国家安全关税背后的国会意图，结束基于 232 条款对盟友的行动和调查。同时，政府应提供并优先考虑与那些做出负责任决定的国家扩大贸易关系，如禁止华为和中兴等公司参与其未来 5G 网络，拒绝加入“一带一路”建设。同时，为了筑牢民主政府，非营利组织、学术界和媒体应该着手建立如哈德森研究所（Hudson Institute）的 Jonas Parelló-Plesner 所建议^[47]的公开的“统一战线追踪器”，这将会让人们了解到中共在海外正在进行的干涉运动。

最后，我们需要更好地将价值观作为我们战略的基本要素。1946 年，凯南向美国政府提出了挑战，要求美国政府“为其他国家制定并

^[43] <https://www.nytimes.com/2011/11/21/opinion/how-china-can-defeat-america.html>

^[44] <https://www.bbc.com/news/uk-politics-48126974>

^[45] <https://www.abc.net.au/news/2019-05-07/nz-says-it-will-find-a-win-win-in-belt-and-road-strategy/11085564>

^[46] <https://www.state.gov/remarks-secretary-pompeo/>

^[47] <https://s3.amazonaws.com/media.hudson.org/files/publications/JonasFINAL.pdf>

推动一个更积极、更有建设性的某种世界图景，这是优于我们过去所推动的我们将希望看到的世界”。当我们思考我们希望看到一个什么样的世界——以及我们应该如何最好地就此进行沟通——我们可以做的最坏的事情莫过于将这一愿景放置到我们的基本价值观的口头：我们的宪法和独立宣言描述了我们行为的内部源头。这种平等、自由和法治的愿景与中共提供的未来形成了不言而喻的对比。美国政府应该明确地、不遗余力地刻画出这种对比，突出新疆集中营的人权暴行，对负有责任的人（如中共新疆区委书记陈全国等）实施严厉的制裁，切断使镇压制度得以实现的美国技术流入中国。如果我们不能阐明我们的价值观（和行为）与中共之区别，我们将会把一只手栓在自己的后背的情形下进行大国竞争。

同时，如果我们放弃了这些价值观，转而试图“以中抗中”——在社会控制的道路上走得更远，政府通过行政命令施政而引起企业的反感，或者减少对隐私和言论自由的保护——我们就会迷失方向。正如凯南所说的那样，“在应对苏联共产主义这个问题时，最大的危险是，我们会让自己变得像那些我们正在应对的人一样”。通过更好地了解我们的对手和我们自己，我们可以避免这种结果，防止我们的朋友、盟友和伙伴成为芬兰化的牺牲品，在未来将中共遗弃在历史的灰烬之中。

¹ Edward Luttwak, *The Rise of China vs. the Logic of Strategy*, (Belknap Press, 2012), p. 24-25.

² *Ibid.*, p. 27.

³ Alexander Bowe, “China’s Overseas United Front Work: Background and Implications for the United States,” Staff Research Report, U.S.-China Economic and Security Review Commission (August 2018), p. 3.

⁴ *Ibid.*, p. 6

⁵ David Ian Chambers, “The Past and Present State of Chinese Intelligence Historiography,” *Studies in Intelligence* Vol. 56, No. 3 (September 2012), p. 32.

⁶ Bowe, p. 5-6.

⁷ Jessica Batke, “Surveillance, Suppression, and Mass Detention: Xinjiang’s Human Rights Crisis,” Testimony before the Congressional-Executive Commission on China, July 26, 2018.

⁸ Bowe, p. 10.

⁹ *Ibid.*, p. 12.

¹⁰ *Ibid.*, p. 11.

¹¹ Anne-Marie Brady, “Magic Weapons: China’s political influence activities under Xi Jinping,” Wilson Center (September 2017), p. 8.

¹² John Lewis Gaddis, *Strategies of Containment: A Critical Appraisal of Postwar American National Securit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2), p. 29

¹³ Grygiel, *Great Powers and Geopolitical Chang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2007), p. xii, 170.

¹⁴ Eric Edelman and Gary Roughead, et al, “Providing for the Common Defense: The Assessment and Recommendations of the National Defense Strategy Commission,”

National Defense Strategy Commission, (November 2018), p. 52. *Published on: May 9, 2019*

Mike Gallagher 是海军陆战队退伍军人，威斯康星州第八选区的共和党众议员，众议院军事委员会的成员。

本文原刊于 2019 年 5 月 9 日《美国国家利益杂志》

译：DeepL 软件

校：罗轻舟